

韩国卷

第三届
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
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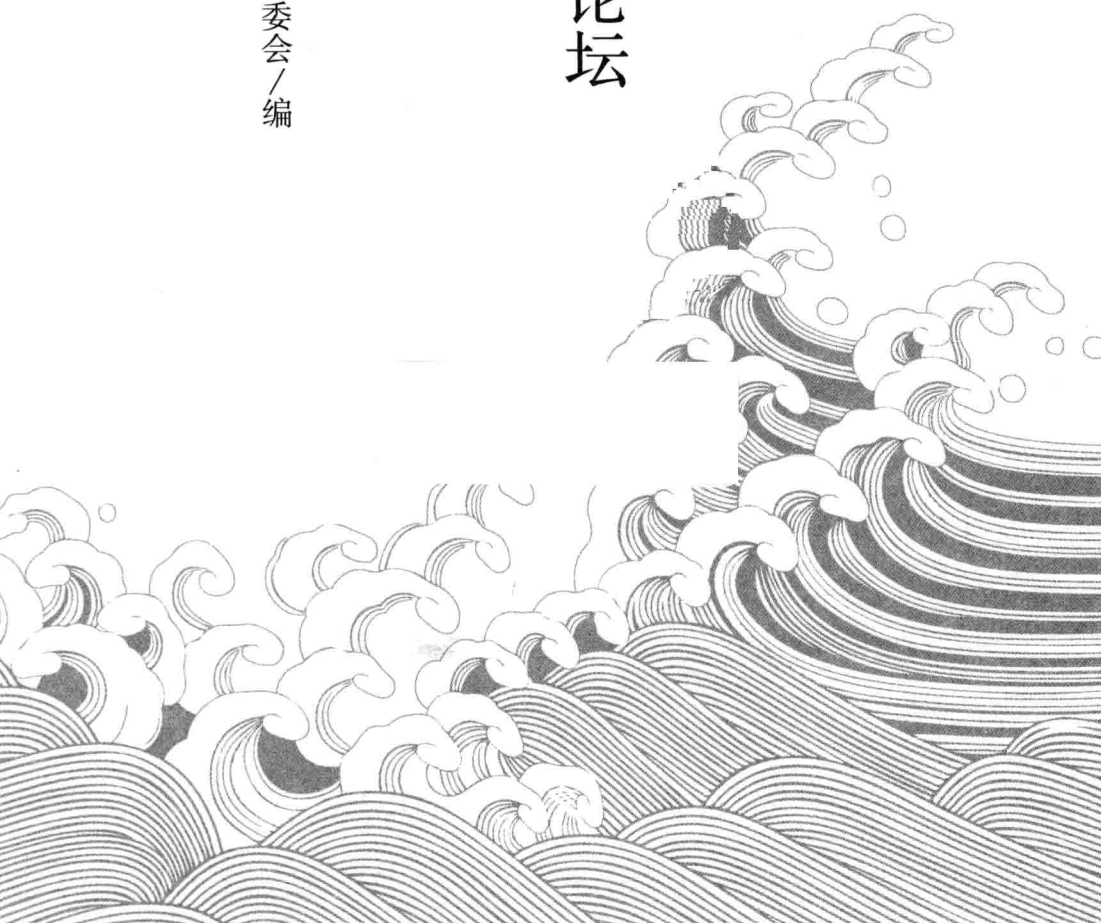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中国组委会 / 编
作家出版社



韩国卷

第三届
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
作品集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中国组委会 / 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作品集. 韩国卷 /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中国组委会编.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063-6637-3

I. ①第… II. ①第… III. ①散文集 - 韩国 - 当代 ②小说集 - 韩国 - 当代 IV. ① I310.15 ②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3729 号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作品集·韩国卷

编 者: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中国组委会

责任编辑: 赵 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67 千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637-3

总 定 价: 120.00 元 (全三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言

铁 凝

继2008年由韩国主办的“第一届韩日中东亚文学论坛”、2010年由日本主办的“第二届日中韩东亚文学论坛”之后，由中国主办的“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即将于2012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为进一步增进三国文学作品的相互交流，促进文学交流方式的不断深化和作品互译的逐渐推进，我们邀请出席本届论坛的三国作家亲自挑选各自的作品，由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三卷本中文版《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作品集》。

作品集分为中国卷、韩国卷、日本卷，每卷分别收录了中国、韩国、日本各11位作家的短篇小说、诗歌、评论、散文等各类作品。中国卷中的作家，包括莫言、张炜、李敬泽、韩作荣、尤凤伟、金仁顺、素素、阿乙这些读者熟悉的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也有熟悉韩国、日本文学的小说家金勋，翻译家许金龙。韩国卷、日本卷中的韩国、日本作家，均为两国当代文坛极为活跃的实力派作家，其中半数左右的作家、作品，是首次在中国面世。在这些作家中，既有评论家崔元植、小说家岛田雅彦这样的韩国、日本文坛代表性的领军人物，也有金爱烂、绵矢莉莎、朝吹真理子这样的“80后”青年女作家，她们和作品集中的“40后”“50后”“60后”“70后”的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共同亮相，形成了

一个连贯而紧密的“45678”。也许数字本身是枯燥的，但数字所包容的内涵往往丰富而深远。这当中，女作家的作品占了不小的比重，日本卷更是占到了一半以上。相信这些正值创作高峰期，作品具有不同特质的“中青年”作家的精选之作，会满足读者的期待。相信三卷本作品集的面世，能够成为整体展示三国当代文学的绚丽橱窗，并能帮助中国读者获得了解、认识自己的邻国——韩国、日本当代文学的一个新视角。

作为读者，我本人除了欣赏三国资深作家的成熟之作，亦从三卷作品集中的一些篇章里嗅到了新的文学气息。比如近年广受关注的中国青年作家阿乙的小说，以极为克制的情感和“残忍”的耐心叙述，表现被忽略的小人物无声的哀恸。比如韩国作家李承雨、金仁淑，和日本女作家朝吹真理子、绵矢莉莎的作品中弥漫出的现代人孤独的焦虑和理性的恍惚几乎是不谋而合。“旧的人和日子已然斩断，而新生活的入境门票却还没有争到”。但毕竟，焦虑本身就是不妥协啊。当我读到日本“70后”青年作家平野启一郎描写受到父母忽略的小哥儿俩偷着远行海边的小说时，我被作家看似单纯实则锐利的语言所打动，这是能够让人疼痛的小说，还让人想起遥远的契诃夫。我亦被韩国“80后”女作家金爱烂的小说所吸引。她以幽默、机智、有趣的语言向我们铺陈开生活的辛酸、温美和外省青年“平躺在城市的地下”的奋斗历程。那“写实的、巨大的、露骨的音调”会使人自然地想起今天的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无数年轻人生存、奋斗的心路历程。而金爱烂的出众在于她并未陷入一己的自我哀怨，她让人发出含着泪光的笑，唤起人有希望的自尊。

三国作家作品集是6年来中韩日作家不间断的文学交流的见证，同时我也期待读者在作品集中听见东亚文学的声音。回顾往昔，亚洲的历史充满伤痕，但亚洲今天的文学正充满活力且胸襟开阔地面对世界。虽然中韩日三国的当代文学尚不能涵盖整个亚

洲的文学品貌，却毫无疑问地呈现着为整个人类积攒文化财富的清新气象。

我和我的文学同行们，正在倾听通过文学呼唤世界的文明和进步，祈望人类心心相印的美丽声音。这也是东亚文学论坛的宗旨之一吧。

是为序。

2012年9月3日

目 录

序言 铁 凝 / 1

崔元植

中国，中国学，以及中国学的振兴 / 2

姜英淑

普里皮亚特仓库 / 14

郭孝桓

郭孝桓的诗 / 28

金爱烂

“哆”调生活 / 44

金仁淑

眩晕症 / 64

金重赫

寥寥 / 84

金津经

会长大的石头 / 108

李承雨

已然，何方 / 118

安度眩

安度眩的诗 / 136

郑标辰

郑标辰的诗 / 148

崔仁硕

每棵树都会说话 / 166

崔元植



中国，中国学，以及中国学的振兴

1. 文学评论的地位

在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中，文学评论家并不多见，更多的是以研究西方文学和韩国文学的学者为主。联想到中国文学的地位，这种现象可谓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结果是不是反映出韩国的中国学研究与现实脱节呢？

自殖民时代至今，韩国的文学批评一直停留在以讨论为中心。1910年，韩国历史上首次失去了自己的政府，在那个时代，文学可以看成是另一个临时政府^①。当时总督府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审查非常严格，而对文学的限制相对来说较为宽松，使得文学成为人们宣泄的工具，而且朝鲜时代文人即是政治家的传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各种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殖民时代的朝鲜文学既是文学也是政治。被封锁的民族政治通过文学得以宣

① “临时政府”被日本帝国主义称作“假政府”，1919年“三一运动”后最初在上海成立。上海临时政府站在国民党一方，而1942年成立于延安的“朝鲜独立同盟”站在共产党一方，可以称作另一个临时政府。这两个临时政府都在韩国以外，而文学在韩国国内代表着当时朝鲜人民的呼声，所以说它是又一个临时政府。

泄，首当其冲的便是文学批评。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KAPF（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家联盟）、国民文学派和中立派之间激烈的争论中即可看出，当代的文学争论虽然披着文学的外衣，事实上，则是围绕着“如何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争取独立”和“建立一个什么形态的独立国家”等问题而展开的一场大讨论。这种特征一直持续到1945年解放之后。在分裂、战争、独裁一系列的考验中，韩国文学依旧，不，应该说以新的面貌继续肩负着政治责任。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文学批评起到了正确的言论导向作用。在整个近现代史中，韩国文学的文学批评不单在文学领域，而且成为影响韩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实践理性”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随着文学地位的下降，文学批评的力量也大不如前。这种现象，或许是缘于韩国民主化的里程碑“6月抗争”（1987）和象征着“20世纪社会主义”崩溃的东柏林事件（1989）之后，韩国文学长久以来的政治传统也开始出现裂缝。尽管如此，韩国文学并没有像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简单地转化为后现代主义，这或许与朝鲜半岛的分裂有关。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分裂”仍如幽灵般出没在韩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韩国文学被置于“分裂”这一悲惨现实中，使得所谓的“分裂”近似于一种“无意识的政治”。因此1990年之后韩国文学表现出退步，便可以看作是它失去了一种政治色彩的同时，呈现出另一种政治色彩。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没必要因为韩国文学与韩国文学批评地位的同时下降而大惊小怪。因为在韩国社会中，文学特别是文学批评地位的下降如同泡沫会消失一样，是很自然的过程。事实上，在此之前，韩国的文学批评由于各种原因承担了过多的义务，反而使得文学批评本身的义务被忽视，而这个下降期便是文学批评本来所具有的文学性与其衍生出的政治性高度结合的时期，同时也是呼应“对于一切主题的精神上的自由活动便是对它无私的爱（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这句话的绝好时机。

国家所处的境遇不同，文学批评的地位也不同。以往中国官员起着文学评论家的作用，而如今文学批评在中国已经呈现抬头之势，但在近代化急速发展的日本，文学批评地位却急速下降。正如柄谷行人在宣布放弃文学批评时所说：近代文学曾经起过对抗政治保守性的革命性作用，而如今放弃了道德课题，堕落成一种娱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文学已经落幕。这一说法不正是典型表现吗？^①文学批评在具有一定自律性的市民阶层中才能得到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现在站在文学批评的入口，而日本则站在出口，韩国则站在中间，三者形成了很有趣的对比。那么韩国会沿着日本^②的轨迹走下去吗？我认为有这种可能。但正如我之前所说，以分裂为首的韩国社会的多重性给文学批评带来了微妙的影响，所以也可能促使新的文学批评类型诞生。

如上所述，韩国的文学评论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化，将其称为具有一定引导性的讨论也并不为过。在韩国，有中国文学研究者经历的文学评论家很少，从这一点可以明确韩国中国学的地位。但是我认为这并非单纯地表现在文学领域。是不是在全部中国学研究者身上都有这种情况呢？

2. 对中国的认识的改变

那么这种现象经常发生吗？当然不是。无论是否在中国体制下，近代以前韩国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是通晓中国。特别是朝鲜王朝确立科举制之后，对于中国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文人是否能够飞黄腾达。对于学习儒家经典并以其为治国真理的朝鲜统治阶

① 崔仁植，《“近代文学的终结”与新的解决办法》，《韩民族》2007.10.27。

② 但是日本也如韩国一样有美军驻守，所以不仅仅是超近代社会。因此日本的近代文学是否已经终结是个有待考虑的问题。

级士大夫^①来说，当时的中国并非“他国”而是“理想中的自我”。但是到了朝鲜后期出现了很有趣的现象，当时士大夫内部出现了不和谐，实学者（性理学者）开始成为了解中国的先锋。例如，燕岩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可以说是最优秀的中国见闻记。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野的儒生比当朝的士大夫立场更为自由。所谓的“自由”是指他们对于中国有着“热情和冷静”的双重态度，因此可以保持适当的带有批判性的距离，这对于当时还很落后、为了改革而向清朝学习的朝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本游记摒弃了对满洲帝国的偏见，记录了其繁荣的真实面貌，并且敏锐地捕捉了屈从于异族统治之下的汉族人的苦痛，这本游记因作者所处的朝鲜这一“场所精神（genius loci）”，而变得与众不同。

近代之前读书人对中国的认识有着怎样的轨迹呢？在西方资本的支持下，日本的侵略使得中国四分五裂。值得注意的是，其开端便是围绕着当时的朝鲜问题展开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自此朝鲜开始了“去中国化”。朝鲜王朝拆除了象征着隶属于中国的迎恩门，在原处建造了独立门（1897），象征着朝鲜脱离了长久以来中国的统治和影响。与此同时，文明的标准从中国缓慢但明确地转向为学习西方的日本。最明显的表现在西方事物的名称上。例如train（火车）一词，中国将其译为“火车”，而日本将其译为“机车”，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选择了后者将其命名为“机车”。这一点还最明显地体现在对中国的称谓上。近代日本在特殊的民族优越感支配下将中国称作“支那”^②，而这个名称在当时的朝鲜也得到了

① 朴趾源所定义的“士大夫”是“读书曰士，从政为大夫”，而李佑成在此基础上做了更明确的定义：我国的士大夫是由读书的“士”与从政的“大夫”的结合体，但二者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而指的是既是读书的“士”又是从政的“大夫”的人。《韩国历史上》（创作与批评社，1984）214页。

② “支那”原为汉译佛经中古印度人指称中国的梵语“cina”的音译，国学兴盛的江户时代，日本知识分子将该词作为一个中性名称重新使用。但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这个词渐渐带有侮辱的意味。加藤微著，韩明熙译，《贝的中国人，羊的中国人》（随喜斋，2007）260—261页。

普及。不仅亲日派，就连强硬的抗日独立派也选择使用“支那”一词。文人出身流亡中国的独立运动家丹斋申采浩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这么做是想告诉世人，抗日的最终目的不是再次回到中国的庇护之下，而是寻求真正的独立，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之后加快了去中国化的脚步，导致对于中国的认识持续减退。

1945年韩国解放，也未能改变这一情况。尽管民族解放运动以中国为舞台如火如荼地展开，美苏联合战线的胜利使当时朝鲜获得独立，但是朝鲜却未能逃脱南北分裂的命运。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联合战线的破裂，1948年在朝鲜半岛南北先后出现了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个政权。第二年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本想在中国以国民党为中心，在日本利用傀儡天皇进行统治实行双重战略，但是随着国民党的战败，美国开始强化日本天皇的象征作用，以此来达到与苏联和中国对抗，推行反共封锁政策的目的。此时朝鲜战争（1950—1953）爆发，以此为契机，冷战体制开始蔓延到全球。韩国成为美国控制东亚的一个孤岛。也就是说，这个时期韩国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与中国大陆断绝联系，这源自对中国的敌对意识以及无知”^①。

而且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作为朝鲜的战友被韩国视作敌人。因此在当时坚持反共政策的韩国政府看来，中国以“中共”的名字与朝鲜和苏联一样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即使在那个严酷的时代也有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人。解放之后毛泽东的著作被翻译到韩国，例如《新民主主义论》（我们书院，1946），通过旧书店进行地下流通，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种现象，虽然其影响较小。

值得瞩目的是，与此相比韩中两国的交流被韩国与台湾地区的官方交流所代替。此时台湾便是中国的代名词。严谨地说，这与韩国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朝鲜半岛是类似的。总之，韩国与台湾地

① 崔仁植，《前途后藏着的神：赛珍珠的〈大地〉》（2000），《文学的回归》（创作与批评社，2001）149—150页

区作为美国反共包围圈中两个重要的中心，以“自由中国”与“自由大韩”的名义，与中国和朝鲜的友好关系形成对立关系。在朝鲜停战线和中国两岸关系基础上的韩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近代以前的韩中关系。李承晚政府（1948—1960）对于临时政府主席金九（1876—1949）被暗杀一事负有责任，也就对继承临时政府体制持保留态度。但是从历任临时政府国务委员的李始荣（1868—1953）被任命为第一代国家副总统这点来看，李承晚政府也表现出了继承临时政府体系的双重性。众所周知，蒋介石（1887—1975）当时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强有力的支持者，而汉字作为共同使用的书面文字，使得双方能够进行交流^①，还有就是台湾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比韩国富裕^②，这三点重叠在一起使得这个时期中韩交流显得相对微妙。

1992年随着中韩两国建交，韩台关系与中朝关系这对在冷战体制下对抗的劲敌也随之解体。韩国与台湾断交转向建立与中国的关系。韩台关系解体，中韩关系迎来了春天。但是韩国人对于中国的认识并没有随之得到提高。在反对朴正熙（1961—1979）的反独裁民主化运动过程中，人们很自然地了解了中国革命，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是因违反反共法被逮捕的李泳禧所作的《与8亿人的对话》（创作与批评社，1977）。这是一本了解“文化大革命”时期现代中国的最好的入门书籍，书中描述的中国完全不同于韩国人所了解的中韩建交以后改革开放的中国。韩国人发现这个差异后，表现出一种一面惊叹一面轻蔑的复杂心理。在中国面前所表现出的自卑感才真正阻碍了认识中国。这就是断交带来的危害。而在这种不平衡中韩国人对于台湾的认识也无法更新。终于在2000年，台湾民进党上台后，韩国人又一次接触到了“台湾独立论”，开始对台湾另眼相

① 彭国栋编、辛镐裂译，《韩中史诗》（公报室，1960）是具有代表性的诗集。

② 这与中朝交流相较有差异。众所周知，朝鲜战争之后朝鲜经济高速发展，宣称比韩国和中国富裕。当然，最近中朝关系也像韩台关系一样发生了逆转。

待。韩国也开始像国民党一样，反省以前将中国与台湾分开来看的态度^①，看到了中国的多面性。而且建交以后，中韩关系不仅在政府间，民间交流也是处于磨合的阶段。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说过，“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②，我们正处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格局解体的非常时期。但是即使不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单极格局或者中美两分世界的情况，中国在社会中担负的责任也一定比现在更重大。所以现在正是提高韩国社会对中国认识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说，中国对韩国都不太了解，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中国呢？因为我们不应等待别人，而应以诚意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罢了。“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③

3. 真实的中国学

当今时代，对于中国的认识再次深切关系到韩国和朝鲜半岛的未来。现在不仅应该警惕甲午战争特别是冷战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对中国的敌对和无知，而且应该认识到面对中国就采取“事大主义”的态度，也不能算是真正的认识中国。而更重要的是改变中韩建交以来两国交流扩大中出现的，仅在文化上消费中国，却对中国的现实一无所知这种状态。虽然我之前说过随着传统中华体制的瓦解，韩国对中国的认识也在日趋减弱，但是与韩国汉字文盲泛滥的今天相比，冷战时期认识汉字的人是非常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

① 虽然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台湾独立论，但是对于台独论的现实性持保留态度。就以往的经验来看，支持台独的人士也会突然转向支持中国大陆，而对台湾也是保持中立的。

② 这句话来自2008年7月27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中美战略会议的开幕式祝词中的一段。

③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卷十二，颜渊篇。

人事实上对于“中共”是非常无知的，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例如比任何韩国小说都广为人知的《三国演义》便是其中的代表作。我想说说我个人的经历。1995年我初次来中国时，有三点让我很吃惊。第一点便是在中国的大街上我几乎成了文盲。因为简体字对于我来说几乎就像是暗号代码。第二点是在韩国的时候我很爱吃中国料理，但没想到来到中国后会饱受饮食不习惯的折磨。后来我才知道，我所熟悉的中国料理是长期在韩国经过改良的“清朝料理”。第三点便是当我吟着崔颢的诗登上黄鹤楼时，并没有看到江水，这使我感到既荒唐又难忘。远远地望着白茫茫的江水我感到无可奈何，看了介绍才知道原来这里曾经一度洪水泛滥，长江为此改道而行。我脑子里对中国的印象，在面对真实的中国时瞬间坍塌了。在与中国完全没有来往的情况下，仅凭过去的经验想象中国，但当我真正站在现实的中国面前，现实与印象的背离让我备感困惑。所以某种程度上，韩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熟悉感，反而会影响他们对于真实中国的认识。

在与中国隔绝的情况下，只凭古代典籍消费中国文化而不去了解实实在在的中国，这在如今国外旅游已经自由化的后冷战时代，可谓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难道是熟悉汉字的一代人把这种特征传给了汉字文盲这一代吗？前面提过的《三国演义》一书，现在在韩国仍然很畅销，这说明现在的年轻人也很喜爱中国文化。尽管如此，中韩两国之间在网络上的对骂战却时有发生。中国的“80后”们享受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益处的同时，陷入对政治的不关心之中。而韩国社会虽然同时实现了民主化和经济增长，年轻人却为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感到不安。高原基彰将两国年轻人之间的这种争斗与旧民族主义相区分，命名为新民族主义。但是把对于未来的不安转化为对邻国的蔑视这一点二者是一致的^①。为了改变在消费着

① 崔仁植，《东北亚和平备忘录》（2008），《帝国之后的东亚》（创作与批评社，2009），41—43页。